

# 政治制度与社会科学范式自主性\*

——比较历史视野下的德国与美国

银培菽

内容提要:近年来,自主知识体系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但知识范式的自主性尚未得到充分探讨。“范式自主性”指特定国家的知识社群对社会科学范式的选择性采纳与变革的倾向。范式作为知识体系的“骨架”,不仅体现方法论,更通过方法论的选择反作用于认识论和本体论,从而塑造知识生产的路径。本文通过分析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与范式自主性的内在关联,试图解释国家为何接纳或拒绝某种普遍流行的社会科学范式。研究发现:在一系列国际和国内因素中,政治制度是造成社会科学范式选择差异的核心因素。在政治制度影响下,知识社群会优先接纳与本国内源性意识形态相容的范式,以强化制度合法性。德国与美国的案例(19—20世纪)表明,实证主义范式关于个人主义、普适性规律的假设与德国的制度“水土不服”,而与美国的多元民主制和意识形态高度契合。为此,德国发展出历史主义范式来解释自身独特命运,而美国则借助实证主义范式的“价值中立”原则,助推现代化理论、民主和平论等知识的全球传播。范式自主性是国家理性在知识领域的表现之一,但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与嵌入性是互为前提的,历史上两种“范式自主”的陷阱为我们提供了历史镜鉴。

关键词:社会科学范式 自主知识体系 意识形态 实证主义 历史主义

围绕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学界展开了一系列讨论。<sup>①</sup>然而,其中关于范式自主性的研究较少。“范式”是哲学用语,指体系或范例。它是指在一个时代里人们对事物具有支配地位的看法,特别是理应成为处理科学问题的前提、在某个时代人们公认的、有系统的思想体系。<sup>②</sup>知识体系如果被理解为包含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上层建筑,那么范式从方法论出发,影响认识论和本体论,对知识体系有“骨架”的意义。历史上的大国都谨慎地选择社会科学范式。“社会科学”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美国宗教类基金会智库复合体的政治影响机制研究”(21CZJ003)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宗教对当代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的影响”(24&ZD202)的研究成果。本文曾在第七届北大一复旦“国家治理深度论坛”和第四届“历史政治学年会”上汇报,感谢与会专家提供的宝贵意见。

① 郁建兴、黄飏《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及其世界意义》,《政治学研究》2023年第3期;郭忠华《政治概念移植的现实基础和形变模式》,《政治学研究》2023年第5期;冯书生《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视域中的学术期刊与知识生产》,《科技与出版》2024年第1期。

② 野家启一:《库恩:范式》,第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一词于18世纪末出现在美国和法国。<sup>①</sup>此后,各种范式以不同的“颗粒度”出现,越是晚近,范式越是细分,实证主义、解释主义、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是其中典型的几种。<sup>②</sup>如果以19世纪的眼光来看,上述的后面四种范式都在“历史主义”(historicism)的谱系内,是某种“反实证主义”的子集,它们反对实证主义以自然科学为模型来理解社会。在此意义上,实证主义是一个靶子,一种宏大的“元范式”。而历史主义强调人类现象的偶发性和多元差异,主张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下研究社会。历史主义范式起源于德国,它对英国、法国和美国有昙花一现的影响。<sup>③</sup>最终,实证主义成为西方各国主流的社会科学范式,而反实证主义范式逐渐分流,再难产生与其势均力敌的影响。为什么一个国家选择或接纳某种范式作为本国社会科学的主流取向?这是本文致力于回答的问题。

## 一、范式的国别差异

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作为两种层次相近的“元范式”,其分歧在于社会科学该不该采用自然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两种范式扩散到不同的民族国家之后,各国会谨慎地做出选择。范式选择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有关的问题。

### (一)“元范式”与自然科学

19世纪是社会科学迅速发展的时期,当时有两种研究的“元范式”,一种是模仿自然科学,另一种是警惕自然科学的影响。前者演变为实证主义,它从经验中抽象出普遍规律,以模型来表现真实生活中历经时间空间才能体悟的经验,如笛卡尔(René Descartes)所说的“通过模型化实现‘一目了然’(uno intuitu)”。<sup>④</sup>19世纪初,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开创了另一种范式,坚持使用第一手实证资料,通过对特殊事物的感知来获取知识。<sup>⑤</sup>兰克的方法被概括为“历史主义”,作为一种范式从历史学外溢到整个社会科学领域。

有文献研究表明,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层次相近、观点相反,两者在认识论、方法论上都存在对立。《剑桥社会科学史》将历史主义单独列为一章,指出德国历史主义与英法实证主义的“巨大差别”。<sup>⑥</sup>波普尔(Karl Popper)的《历史主义的贫困》认为,历史主义是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途径,特点是“强烈反对社会科学领域中方法论的自然主义”。波普尔指出,自然主义也被称为“实证的”,即认为自然规律“在所有时间和空间都有效”。<sup>⑦</sup>米勒(Eugene F. Miller)在政治学范畴内,总结了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作为范式的三方面差异。第一,“直接经验”(sense-data)是否可以被人类原原本本地感知;第二,人的思想是否可以不受历史和环境条件束缚;第三,“绝对真理”是否存在。实证主义对于三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历史主义的回答都是否定的。米勒认为,历史主义的确发源于德国,受三种思想的影响: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的“生命哲学”(Lebensphilosophie)、马尔堡学派的新康德主义(Neo-Kantianism),以及从胡塞尔(Edmund Husserl)到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现象学。<sup>⑧</sup>

①③⑥ 西奥多·M. 波特、多萝西·罗斯主编《剑桥科学史:现代社会科学》第7卷,第14页,第114页,第126页,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

② 诺曼·K. 邓津、伊冯娜·S. 林肯主编《定性研究:方法论基础》第1卷,第204页,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④ “图表、示意图、概要等,都是一目了然,呈现出在时间里鲜活的那些东西的一个单一视角、一个瞬间、一瞥。”参见皮埃尔·布迪厄《经济人类学:法兰西学院课程(1992—1993)》,第3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⑤ 多萝西·罗斯《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第26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

⑦ 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第4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⑧ Eugene F. Miller, “Positivism, Historicism, and Political Inquir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6, No. 3, 1972.

## (二) 范式扩散的国别差异

范式的扩散(diffusion)有明显的国别差异,民族国家向来不会被动地内化某种研究范式,而是在充分的探索和比较后,谨慎做出选择。19世纪以来“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研究机会和文化传统下产生了不同的学术成果”。<sup>①</sup>当实证主义扩散到西方各国时,历史主义也在德国并行发展。

在德语中,科学(Wissenschaft)指代一切系统性、方法严谨的知识体系,这使德国学界发展出“人文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和“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的二分法:前者关注历史语境中的意义理解,后者追求普遍规律。例如,现象学之父胡塞尔是数学家出身,他认为科学为了获得普遍规律的模型破坏了时间性,让一切现象瞬时化或共时化,导致生活世界的原初经验被遮蔽。<sup>②</sup>韦伯(Max Weber)进一步提出,社会科学的核心任务不是效仿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的逻辑是“一个绝对普遍有效的公式体系”,而文化现象不可能从公式中推导出来。<sup>③</sup>为此,他提出了“历史的社会科学”这一创新构想,认为社会因果关系的本质是“受概率检验的”,需要通过历史情境下的经验研究来检验。<sup>④</sup>韦伯提出“理想类型”(ideal-type)概念,在历史特殊性与理论普遍性之间建立起辩证的中介机制:理想类型既来源于历史现实,又通过概念抽象于具体经验,从而实现经验研究与理论建构的有机统一。<sup>⑤</sup>这一方法论创新不仅解决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认识论难题,更为后续社会科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德国历史主义并非彻底排斥实证主义,而是重构其适用性。

在19世纪,德国历史主义与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实证主义知识社群之间有充分交流,政治学研究也并未脱离历史研究。18世纪的英法启蒙史学中有关政治的研究,启发了后续德国的历史主义范式,如伏尔泰的《风俗论》(*Essai sur les mœurs et l'esprit des Nations*)、休谟(David Hume)的《英格兰历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吉本(Edward Gibbon)的《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sup>⑥</sup>1825年,兰克正式到柏林大学工作后,德国历史主义范式逐渐得以系统化,并反向影响英法。法国1868年创立“高等研究实践学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吸收德国的文献考据方法,但融合了法国学术传统。英国学者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和西利(John Robert Seeley)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推广德国式历史研究。参照德国1859年创立的《历史时代》(*Historische Zeitschrift*),西方国家相继创办学术期刊,如1876年法国的《历史评论》(*Revue historique*)、1886年的《英国历史评论》(*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和1895年的《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直到19世纪最后25年里,美国政治学家们还吸收利用了不少德国、英国、法国学者的思想。<sup>⑦</sup>

20世纪以后,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日益分化,以政治学为代表的美国的社会科学几乎扬弃了历史主义范式。芒克(Gerardo L. Munck)认为,大约从1883年到1910年,美国发生了一场方法论之争,部分接纳历史主义的美国政治学奠基人与仿效自然科学的新政治学之间产生分歧,最终是前者败下阵来。<sup>⑧</sup>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晚年移民到美国,是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他批判历史主义“一方面拒斥科学定律的实证主义要求,另一方面又主张经济理论可以从

①④⑥⑦ 西奥多·M. 波特、多萝西·罗斯主编《剑桥科学史:现代社会科学》,第7卷,第214页,第70页,第120页,第126页。

② 皮埃尔·布迪厄《经济人类学:法兰西学院课程(1992—1993)》,第31页。

③ 多萝西·罗斯《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第519页。

⑤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第83—84页,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版。

⑧ 赫拉尔多·L. 芒克、理查德·斯奈德《激情、技艺与方法:比较政治访谈录》,第46页,当代世界出版社2022年版。

社会的经济经验之中抽象出来”。<sup>①</sup>这反映了美国学术界在二战后已经将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对立起来。1903年美国政治学协会(APSA)的成立,标志着美国史学和政治学彻底分开。<sup>②</sup>梅里亚姆(Charles E. Merriam)在芝加哥大学的活动以及他1921年发表的一篇关键文章《政治学研究的现状》(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Study of Politics)提高了实证研究、量化方法在政治学中的地位。<sup>③</sup>推崇该研究方法的“芝加哥学派”成为推动政治学范式变革的重要力量。在芝加哥学派的影响下,行为主义(behaviorism)于20世纪50到60年代成为席卷美国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与之相伴的“价值中立”原则被广泛接纳——这一概念起源于韦伯提出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原则。行为主义将其解读为,只需剥去不相关的形而上学的假定,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sup>④</sup>至此,无论从方法论还是认识论,美国社会科学都日益偏好实证主义范式,历史主义在美国的影响力逐渐消退。

### (三) 范式选择的政治原因

为什么社会科学范式在各国逐渐分流,而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达成共识?理解这一问题的前提,是认识到西方社会科学是功能性地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

罗斯(Dorothy Ross)在比较美国和欧洲之后认为,社会科学范式的确定,不仅是基于理智的选择,也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决定。<sup>⑤</sup>换句话说,社会科学不是完全以客观中立为取向,而是在服务现实和追求真理的双重目标下发展。罗斯认为,社会科学学科的形成是一个“构划”(project)的过程。这一概念旨在表明,社会科学学科既非单一由科学逻辑支配,亦非纯粹主体意志的自由产物,而是话语与实践交织的动态场域。<sup>⑥</sup>第一,构划的历史背景是自由主义知识精英进入权力中心所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促使他们产生变革社会科学的动力。<sup>⑦</sup>面对劳工运动、城市化等问题,美国进步主义改革者、英国费边社成员推动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中发展,试图通过科学手段管理社会矛盾。1870年后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形成,法国第三共和国时期的地理学派的形成,以及冷战期间美国的区域研究,都反映了“构划”广泛存在于大国社会科学中。<sup>⑧</sup>第二,构划的过程充满偶然性与冲突(contingency and tension),是“众多的参加者为占领和控制一个激烈竞争的实践领域而进行的持续斗争”。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民主化和知识科学化是塑造社会科学的两股力量。<sup>⑨</sup>第三,政治制度影响社会科学范式,许多学术观念都与所在国的制度有联系。沙巴斯(Margaret Schabas)认为,英国的制度稳定性为政治算术(political arithmetic)<sup>⑩</sup>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基础。<sup>⑪</sup>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认为,德国历史主义体现了对代议制资本主义工具化的国家概念的反抗,将国家视为“精神实体”,

① 米塞斯《米塞斯回忆录》第4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

②⑨ 多萝西·罗斯《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第402页,第73页。

③ Gabriel A. Almond, *A Discipline Divided: Schools and Sects in Political Science*, Calif.: Sage, 1990, p. 291.

④⑤⑧⑩ 西奥多·M. 波特、多萝西·罗斯主编《剑桥科学史:现代社会科学》,第7卷,第216页,第33页,第39页,第182页。

⑥ 罗斯援引多个哲学观点来解释“project”这个术语,中文版将其翻译为“构划”,Dorothy Ross, “Changing Contours of the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 edited by Theodore M. Porter and Dorothy Ross, Vol. 7,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06-208. 西奥多·M. 波特、多萝西·罗斯主编《剑桥科学史:现代社会科学》,第7卷,第206页。

⑦ Roger Smith, *The Norton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Norton, 1997, p. 544.

⑩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在17世纪提出的政治算术,是统计学和经济分析的雏形,通过量化方法(如人口、土地、税收数据)为国家治理提供科学依据。辛向阳主编《西方国家治理思想史(上卷)》,第51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

视为“上帝的思想”。<sup>①</sup>

当代社会科学中,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尤其彰显了科学与权力逻辑的交织。梅里亚姆极力推动政治学“自然科学化”,但他更大的抱负是让美国政治学服务现实。他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力量应该联合起来,完成对人类行为的理解和控制。<sup>②</sup>1913年,APSA关于20世纪美国政治学的规划是:第一,培养公民意识;第二,培养法律、新闻、教学、公共服务等行业的人才;第三,培养政府需要的人才。<sup>③</sup>1923年,梅里亚姆协助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充当了社会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私人慈善基金会之间的桥梁,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区域研究奠定基础。1951—1961年是行为主义发展最快的时期,这也是慈善基金会有意资助和构划的结果。<sup>④</sup>行为主义灵活运用“价值中立”原则回避知识的意识形态色彩,起到为知识“脱敏”的效果,这成为美国政治学国际化的基础。19—20世纪之交,政治学在欧洲仍是一个比较弱势的学科。英国在20世纪初只把政治学作为“政治、哲学和经济学”(PPE)学位的一个分支。法国政治学是“历史、法律和地理学之女”。1920年柏林德国高等政治学校(Deutsche Hochschule für Politik)成立,但是1933年被纳入了宣传部。这一时期,政治学在美国蓬勃发展,从1920年到1945年,APSA的成员从1300人增加到3300人。<sup>⑤</sup>欧洲政治学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独立,1950年在英国成立政治研究协会(PSA)时,政治学已经严重美国化了。

## 二、理论与方法:政治制度如何影响范式选择?

既有文献表明,社会科学范式的选择有政治原因,只是相关的机制尚不明确。本文建构了一个关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范式选择的理论框架,在比较历史分析的“求异法”视角下,对德国和美国的案例进行比较,以检验这一理论。

### (一) 理论建构:意识形态作为中介变量

政治制度对社会科学范式有塑造作用,前者作为自变量,后者作为因变量,二者之间有一个关键的中介变量——意识形态。一方面,任何政治制度都以一定的意识形态为支撑,它是制度合理化的基础,往往强调本民族的特殊性。另一方面,社会科学范式可以塑造意识形态,以普遍性科学的名义评判、挑战和颠覆一国固有的意识形态。

三者关系如图1所示。由于意识到社会科学范式对政治制度潜在的颠覆式影响,国家便有力去自主选择与本国政治制度兼容的社会科学范式。为了保护政治制度的稳定,国家主动选择兼容本国内源性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范式。民族主义兴起以后,民族国家和知识精英对捍卫本国的意识形态独立是很警惕的。意识形态受本国的历史记忆、民族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短时间内难以撼动,其内源性大于外源性。相反,范式的外源性大于内源性,它作为某种共识性的研究框架进行跨国传播时,具有科学的名义。社会科学范式越有影响力,跨越国界塑

①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第23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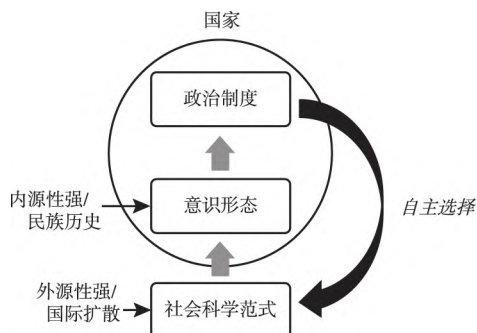
② Charles E. Merriam, *New Aspects of Politi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5, p. 160.

③ Albert Somit, Joseph Tanenhaus,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From Burgess to Behavioralism*, New York: Irvington Publishers, 1982, p. 82.

④ Emily Hauptmann, *Foundations an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Discipline, 1945 - 1970*, 1st ed.,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23, p. 6.

⑤ 西奥多·M. 波特、多萝西·罗斯主编《剑桥科学史:现代社会科学》,第7卷,第316页。

造别国的意识形态的机会就越大。最终,哪一种范式能够长久地影响一国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是各国主动选择的结果。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 (二) 比较历史分析: 德国与美国(19—20世纪)

本文采用“比较历史分析”(CHA)的方法进行案例研究,该方法遵循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比较原则(求同法、求异法、共变法)和在此基础上的一些规范(如最大相似法、最大相异法),以及解剖少数几个案例内部的结构和变化对结果走向的影响。<sup>①</sup>研究对象的可比性更多地取决于研究者的研究目的和分析框架,而非教条式的“控制性比较”。<sup>②</sup>本文聚焦政治制度因素对社会科学范式的影响,用“求异法”来揭示政治制度对社会科学范式自主性的影响机制。

求异法的核心逻辑是“同中求异”,通过比较相似案例中的关键差异来解释不同结果。虽然德国和美国在多个方面存在差异(国际国内皆有),但本文的分析框架(见图2)强调了在众多因素中,政治制度的差异是最为显著和关键的。国际因素是干扰变量,尽管两国在国际环境上差异不小,但其中仍有关键相似之处为趋同奠定了基础。国内因素则是本文重点考察的对象,可以进一步分为政治、学术和经济三个维度。其中,德国和美国政治制度的差异远远大于学术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差异。因此,我们聚焦于政治制度这一核心变量,探讨其如何通过意识形态影响范式选择的差异。

从结果来看,19—20世纪的德国和美国是两个“社会科学深度交融,但范式不同”的案例。德国和美国至少有过三次大规模的知识分子跨国交流。第一次发生在1848年德国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运动失败后,德国的自由主义人士大量移民到美国。<sup>③</sup>第二次在1870年到1900年之间,大约有9000名美国人在德国学习,许多人成了美国社会科学至关重要的人物。<sup>④</sup>第三次是众所周知的20世纪30年代,几百名德国社会科学家因对纳粹政权不满而移民到美国。三次知识社群迁移的时间与历史主义、实证主义的繁荣和扩散是并行发生的。在政治实践中,德国和美国也有许多相似性。两国都使用“共和自由的语言”,都经历了“市场革命”带来的经济和文化混乱,都形成了鲜明的党派政治文化。

① 黄杰《当政治遇上历史——比较历史分析方法(CHA)介绍》,《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1期。

② 杨光斌《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39页,2016年。转引自释启鹏《“丰裕的贫困”——对历史政治学比较方法的反思》,《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7期。

③ 帕尔默等《工业革命:变革世界的引擎》,第89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

④ 西奥多·M. 波特、多萝西·罗斯主编《剑桥科学史:现代社会科学》,第7卷,第21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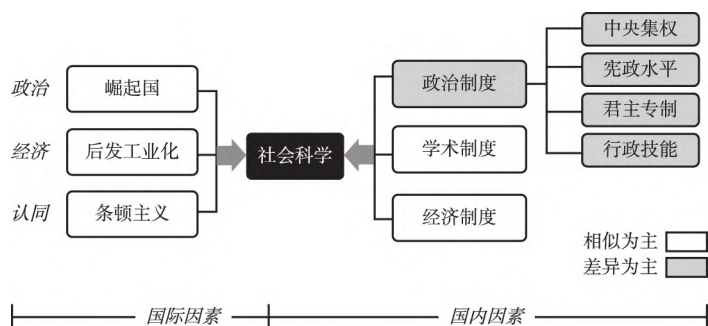


图2 比较历史分析: 影响德国与美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国际与国内因素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 (三) 主要变量解释: 国际与国内因素

在一些与社会科学发展有关的国际因素上(见图2),德国和美国在19至20世纪之交有着相似之处。这些共同因素带来相似的知识发展动力与机遇,意味着两国的社会科学范式有趋同的基础,不应该差异过大。但结果是,美国与其他西方大国趋同,而德国则选择了另一种特殊的范式,这就需要从国内因素中寻找解释。

国内因素包括政治、经济与学术三种制度。一般认为,学术制度被动地受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影响。按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的说法,现代科学是“国家和市场的仆人”。<sup>①</sup>坎贝尔(John L. Campbell)和佩德森(Ove K. Pedersen)根据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组合归纳出四种知识生产体制。第一种,美国为代表的“竞争型”(competitive);第二种,法国为代表的“国家主义型”(statist);第三种,德国为代表的“协调型”(coordinated);第四种,丹麦为代表的“共识型”(negotiated)。<sup>②</sup>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学术制度有一定的独立性,对知识生产的影响不亚于政治和经济制度。伯顿·克拉克(Burton R. Clark)的“三角理论”构建了一个“国家+市场+学术权威”的三维模型,以国家控制、市场体制和学术权威力量的强弱来为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模式找到一个适合的位置。<sup>③</sup>埃茨科威兹(Henry Etzkowitz)提出了类似的“三螺旋理论”,认为“大学-产业-政府”之间的相互作用塑造了现代知识创新的模式。<sup>④</sup>大学、产业和政府正好对应了学术制度、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共同构成了塑造知识生产的三种国内要素。

## 三、国际因素: 关键身份相似

国际因素方面,德国与美国有三个关键身份的相似,使得它们在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中有一定的趋同基础。首先,德国和美国在地缘政治上都属于维也纳体系中的崛起国。此外,在经济上两国都是后发工业化国家,种族上都有条顿诸民族(Teutonic)的身份认同。

### (一) 维也纳体系的崛起国

在地缘政治上,欧洲是19—20世纪初期国际秩序的中心。1814—1815年,奥地利、普鲁士、

① 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第1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② John L. Campbell, Ove K. Pedersen, “Knowledge Regimes and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in Daniel Béland, Robert Henry Cox (eds.), *Ideas and Politic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67 - 190.

③ 伯顿·R. 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第154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④ 亨利·埃茨科威兹《国家创新模式: 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创新战略》,第2页,东方出版社2014版。

俄国和英国在击败拿破仑以后,把新的五大国互动机制命名为“欧洲协调”,形成维也纳体系。在初建立时,英国和俄国是维也纳体系中最强的两个国家,作为海权和陆权霸主,控制着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列强在欧洲的“克制”不影响在亚非拉地区的殖民“自由”。英国征服了南亚次大陆和马来西亚。法国抢占了阿尔及利亚和东南亚,俄国进入中亚和高加索地带,五强之外的美国也占领了墨西哥和夏威夷。<sup>①</sup> 19世纪后期,出现两个崛起国——德国和美国,挑战了维也纳体系的权力格局。1850—1914年,英国和法国的发展速度已经不如德国和美国。原材料产量方面,德国在普法战争之前已经在各项资源产量上超过法国,煤炭和生铁的产量逐渐与英国持平,钢产量在1900年超过英国。美国的增长速度更快,煤炭产量在1880年超越英国,生铁和钢的产量在1870年超越英国。其余维也纳“五强”中,奥匈帝国在1867年前后达到法国水平,而俄国直到1914年才追上法国。德国和美国的崛起,使欧洲五强的权力不再具有垄断地位,甚至可以说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了。<sup>②</sup>

### (二) 后发工业化国家

德国和美国都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的后发工业国(late industrialization)。全球工业化是一种从英国开始的技术进步机制的扩散,兰德斯(David Landes)将其喻为“不受束缚的普罗米修斯”(unbound Prometheus)。英国工业化先传播到西欧和美国,再到俄国和日本,然后到发展中国家。<sup>③</sup>从这个意义上讲,晚于英国的工业化国家都可以说是“后发工业国”。德国和美国与其他后发工业国的区别是,两国利用先发国家的经验快速完成了工业化转型,甚至“后来居上”。俾斯麦时期,德国已经是“工业上的先导国家”。<sup>④</sup>美国1900年的《金本位法案》(Gold Standard Act)颁布后,结束了关于美国是农业国还是工业国的争论,正式向工业国转型。从铁路和电报的问世,到食品、石油、橡胶、玻璃、化学品、机器和金属生产,19世纪末的大量创新都是从德国或美国开始的。<sup>⑤</sup>以有机化学为例,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纺织工业的发展扩大了对染料的需求,但是英国能从殖民地得到天然染料,使英国陷入了技术“舒适区”,对染料技术创新没有太大兴趣。德国科学家霍夫曼(August Wilhelm von Hofmann)在英国开辟了煤焦油染料这一研究领域,并把这项发明带回德国,缺少殖民地的德国将其视若瑰宝。<sup>⑥</sup>有机化学技术促进了德国一批新企业的诞生,如赫希斯特化学工厂(Hoechst)、巴登苯胺苏打工厂(BASF)、拜耳公司(Bayer)等。<sup>⑦</sup>

### (三) 条顿民族认同

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根源上是条顿人,“条顿认同”在19世纪后被德国民族主义重构。<sup>⑧</sup>德国人一般强调自己是“条顿人”<sup>⑨</sup>,而英国和美国人一般强调自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然而,英国本岛早期是被条顿人殖民的,条顿人里包含3个部族:盎格鲁(Anglo)、撒克逊(Saxon)和朱特(Jutes)。这一次殖民从5世纪持续到7世纪初,被称为日耳曼

① 佩里·安德森《大国协调及其反抗者:佩里·安德森访华讲演录》,第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② A. J. P. 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第15—16页,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③ David Lande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

④ 邢来顺《德国通史:民族国家时代(1815—1918)》,第4卷,第44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⑤ 理查德·富兰克林·本塞尔《美国工业化的政治经济学:1877—1900年》,第4页,长春出版社2008年版。

⑥ Christoph Meinel, “August Wilhelm Hofmann ‘Reigning Chemist-in-Chief’”,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in English*, Vol. 31, No. 10, 1992.

⑦ 平森《德国近现代史》,第312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⑧ Peter Mandler, *The English National Character*,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48.

⑨ 利昂·P. 巴拉达特《意识形态:起源和影响》,第51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

人征服(Germanic Conquests)或条顿人征服(Teutonic Conquest)。在征服者中,盎格鲁人的势力最强大,早期的拉丁学者就将古英语称为“盎格鲁人的语言”(Englisc)。Englisc演变成今天的“English”,盎格鲁、撒克逊和朱特这三个部族最终融合为“Anglia”民族。后来,Anglia又演变为Englaland,简化为England。<sup>①</sup>英国人迁徙到北美大陆之后,“盎格鲁”是英国与美国之间共享的种族认同。美国以“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新教徒”(WASP)认同而闻名。所以,追根溯源的话,德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祖辈都是条顿民族。

#### 四、国内因素:三种制度异同

国内因素主要包括学术、经济和政治三种制度。其中,政治制度是德国和美国最大差异之处。

##### (一) 学术制度

“以德为师”体现在美国学术制度的许多方面。南北战争之前,美国高等教育经常被嘲笑为欧洲古典中学的水平。刚独立的美国一度明令禁止海外留学,但后来很快改变了政策,积极促进欧美学术交流。<sup>②</sup>在1810年,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创立柏林大学时形成的,<sup>③</sup>1860年后传播到英国和美国的德国“学术意识形态”(Wissenschaftsideologie),第一条是“创新”:理论创新比大学机构本身更重要,创新让大学在精神和哲学上重新焕发青春。第二条是“学术”,它使大学教育区别于养家糊口的“面包学业”,影响了德国高校的教学体系,将综合性大学与应用型职业技术教育分开。第三条是“教化”(Bildung),这一概念比教育(Kultur)更深刻,指通过精神、身体和社会以及文化方面的塑造,使受教育者形成完整的人格(Persönlichkeit)。第四条是“批判”,起源于康德的哲学,强调从学习现存的知识成果转向批判性思考,形成了德国学术传统中的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研究方法。此外,德国的许多学术制度也被美国采纳。研讨班(Seminar)最早出现在哥廷根大学。19世纪中叶,海德堡大学、波恩大学以及柯尼斯堡大学也开设了自然科学方面的研讨班。研讨班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博士学位,推动了学术化和分科化,形成了以“院/系”为单位的现代大学组织形式。同行评审制度、现代实验室等科研制度都最早在德国出现并得到了良好发展。所以美国教育史学家鲁迪(S. Willis Rudy)认为,正是因为美国的大学融合了英国学院和德国大学的要素,才变成“世界教育史上独一无二的机构”。<sup>④</sup>

##### (二) 经济制度

德国和美国都在19—20世纪初建立起大企业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和工业实验室制度。例如,德国19世纪成立的克虏伯(Krupp)、蒂森(Thyssen)等特大型企业,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德国提供了大量武器。美国也完成了现代企业组织转型,出现了所谓的U型和M型企业。1877年,德国颁布《专利法》(Patentgesetz),赋予新技术的发明者一定期限的专属权,使其能够从发明中获利。美国于1890年颁布《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保护贸易和限制垄断行为,倒逼大企业创新。德美两国的许多技术创新得益于工业实验室。19世纪初期,实验室还十分边缘化,被认为是药剂师的培训机构,但德国拜耳公司等已经开始建立工业实验室。19世纪末,德国大企业

<sup>①</sup> 李然、戴卫平、李焱《英语词汇文化喻义研究》,第106页,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版。

<sup>②④</sup> 贺国庆《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第213页,第184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sup>③</sup> 彼得·沃森《德国天才2:受教育中间阶层的崛起》,第10页,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的实验室实现了教育与科研的结合,形成了现代博士生培养模式的雏形。<sup>①</sup> 20世纪初,大企业实验室也在美国兴起。工业研究实验室及其研发活动成为美国企业发展的显著特征。<sup>②</sup>

保护性关税是德国和美国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相似点。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被誉为贸易保护主义学说的奠基人。李斯特因其政治活动和激进主张在德国遭到迫害,于1825年流亡美国。在美期间,他接受了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幼稚工业”理论,参与了自由贸易派与贸易保护主义者之间的论战。李斯特的经济学说对美国内战前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sup>③</sup> 同一时期,美国经济学家凯里(Mathew Carey)借鉴歌德(Goethe)的自然史思想,提出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凯里的学说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被翻译成德文,在德国传播。<sup>④</sup> 李斯特和凯里的思想相互呼应,这不仅是德国与美国知识交流的结果,也共同塑造了两国19世纪的经济制度。1879年,德国制定了新关税法,并在1885年、1887年继续上调关税。<sup>⑤</sup> 美国在1890年通过《麦金莱关税法》(McKinley Tariff Act),从较为自由的贸易政策转向高度保护主义政策。<sup>⑥</sup> 德国和美国这两部法案的颁布,均体现了后发工业化国家通过保护性关税促进本国产业发展的趋势。

### (三) 政治制度

德国和美国的最大差异是政治制度,体现在中央集权、宪政水平、一元君权和行政技能四个方面。

德国中央集权的程度高于美国。美国1787年的《联邦宪法》确立联邦制,各州保留较大自治权。南北战争虽涉及州权问题,但战后国家结构仍保持稳定,联邦权威有所增强。德国虽采取联邦形式,但中央集权的程度远高于美国,尤其是普鲁士主导的军事-官僚体系使帝国政府呈现高度的集权特征。德国国家建构的过程相当曲折——1806年拿破仑建立莱茵联邦,抬高小邦权力,挑拨普奥相争,阻碍统一进程。<sup>⑦</sup> 1871年发生普法战争,普鲁士主导了德意志民族统一,所建立的德意志帝国虽名义上是联邦制,但是联邦议会(Bundesrat)仍受普鲁士控制。

德国的宪政水平低于美国。美国的宪政体系以分权制衡、司法审查和公民权利保障为核心,尤其强调尊重个人自由,而德国的宪政发展经历曲折。1848年革命期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尝试制定《保罗教堂宪法》,建立君主立宪制,设立由普选产生的议会,但因普鲁士等大邦反对及革命失败,议会解散,宪法流产。<sup>⑧</sup> 1871年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宪法确立了以普鲁士国王为皇帝的联邦,但未规定公民基本权利,宰相由皇帝任命,形成“立宪制的假象”。<sup>⑨</sup> 该宪法成为一个包含联邦和邦联因素的混合物,分裂和大一统两种传统都保留了下来。<sup>⑩</sup> 19世纪的德国是“用议会装饰着的君主专制体制国家”,它没有内阁,行政权集中于宰相,宰相制约皇帝权力的“副署权”是虚置的,实际上为皇帝的行为承担责任。<sup>⑪</sup>

德国一元君权(monistic)的程度高于美国。美国排斥任何形式的君主制。相比之下,德国将普鲁

① 赵俊杰《科技复兴:欧洲的梦想与现实》,第201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② 赵克《工业实验室的社会运行》,第13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③ 贾根良《李斯特经济学的历史地位、性质与重大现实意义》,《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1期。

④ 多萝西·罗斯《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第72页。

⑤ 朱华进《19世纪晚期欧洲贸易条约与协定浪潮》,《学术探索》2019年第1期。

⑥ 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第50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⑦⑨ 平森《德国近现代史》,第51页,第220页。

⑧ 帕尔默等《工业革命:变革世界的引擎》,第88页。

⑩ 邢来顺《迈向强权国家:1830年—1914年德国工业化与政治发展研究》,第72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⑪ 韦伯认为,威廉二世的宰相多为军人,军人的秉性是服从命令而不是制定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导致德国在俾斯麦之后“被一群疯子统治”。丁冬汉《现代国家政治能力建构的逻辑(上)》,第34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士君主制视为理想化国家形态。<sup>①</sup> 君主制在德国有悠久的历史 这对德国社会科学最深刻的影响是将君权“美学化” 认为真正的君主是“艺术家中的诗人” 就像一人身兼导演、编剧和主角 君主是一个属于全人类而非某一个具体国家的人 君主与共和国的关系就像身体与灵魂的关系。<sup>②</sup> 一元君权思想在 19 世纪的英国和美国消退 取而代之的是多元主义国家理论: 国家是存在的, 但它是由组织化的利益和功能组成的。多元主义国家的政治现象可以被科学地解释, 但不会被神圣化。<sup>③</sup>

德国行政技能的水平高于美国。威尔逊( Woodrow Wilson) 在研究美国的行政科学时认为, 英美过于注重宪法和大众民主, 轻视了行政技术的发展, 而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父权制国家”( paternal administrative states) , 为了维护专制, 精妙地掌握了管理国家的行政技艺。<sup>④</sup> “官房学派”是德国 17—18 世纪的行政科学, 到 19 世纪被重新命名为“行政科学”和“社会政策”, “官房”( Kammer) 一词意味着全能的财政部。<sup>⑤</sup> 开明专制与行政技能的早熟使得政治与经济不分家, 成为德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色。

## 五、社会科学范式的自主性

案例比较的结果显示 德国的政治制度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代议制国家不同 这种制度以“父权制国家”的意识形态为支撑, 即共和主义强、自由主义弱。这就解释了德国为何比美国更追求“范式自主”: 意识形态是政治制度合法性的依据, 外来知识范式如果不能与本国意识形态兼容, 将有颠覆政治制度的危险。

### (一) 案例比较结果

国际因素中 德国和美国有三组关键的相似因素。作为维也纳体系中的崛起国, 它们比体系内其他大国更有趋同的基础。尽管如此, 德国和美国在大量的知识交流后仍然选择了两种相反的元范式。

表 1 比较历史政治学视角下 19—20 世纪的德国与美国

		德国	美国	
国际因素	政治	维也纳体系的崛起国		
	经济	后发工业化国家		
	文化	条顿民族认同		
国内因素	学术制度	现代学术意识形态、研讨班、同行评审		
	经济制度	大企业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工业实验室制度、保护性关税制度		
	政治制度	中央集权	低	高
		宪政水平	低	高
		一元君权	高	低(无)
行政技能		高	低	

① 格奥尔格·C. 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第 358 页, 译林出版社 2014 年版。

② Novalis, “Glauben und Liebe”, in *Fragmente* (ed.), *Kluckhohn*, No. 33, 1929.

③ 西奥多·M. 波特、多萝西·罗斯主编《剑桥科学史: 现代社会科学》, 第 7 卷, 第 314 页。

④ Woodrow Wilson, “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2, No. 2, 1887.

⑤ David Lindenfeld, *The Practical Imagination: The German Sciences of Stat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续表

		德国	美国
意识形态	自由主义	弱	强
	共和主义	强	弱
	国家观念	“父权制国家”	“多元主义国家”
研究范式		历史主义	实证主义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国内因素中, 德国和美国在经济制度与学术制度上存在细微差异( nuanced differences), 但远不如今天迥异。按照现在的共识, 美国的经济制度是市场资本主义, 德国的经济制度是协调型( coordination) 资本主义。然而两国在 19 世纪都介于英国的纯粹自由放任( laissez faire) 与法国的国家主导( state-led) 经济制度之间——政府发挥一定的保护和引导作用, 不会深度干预经济。许多研究把美国归类为政府参与的“混合经济体”。<sup>①</sup> 经济因素被美国用于塑造政治力量、建立政治联盟, 把区域和地区利益集团凝聚在政治目标之下。<sup>②</sup> 学术方面, 德国将“创新、学术、教化和批判”的学术意识形态制度化。美国一方面积极效仿德国的现代学术意识形态、研讨班、同行评审科研制度, 另一方面以缓慢的改革来推进高等教育从私有化转向公私合作。

两国核心的国内因素差异在于政治制度。德国是高中央集权、低宪政水平、高一元君权和高行政技能; 美国的政治制度特征是低中央集权、高宪政水平、低( 无) 一元君权和低行政技能。

意识形态上, 德国自由主义弱、共和主义强, 表现为“父权制国家”观念; 美国自由主义强而共和主义弱, 表现为“多元主义国家”观念; 后者是代议制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持有的国家观念。在德国传统中, 共和主义( gemeinsinn) 是一种政治和道德上的“公共精神”, 它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捆绑在一起, 追求“共同利益”( gemeinwohl)。在法国大革命之后, 德国虽然出现了“宪政自由主义”, 设想成立一个君主立宪国家和代议制政府, 也有不少中产阶级支持这种观点, 但 1848 年法兰克福议会运动失败后, 德国的自由主义人士逃亡美国, 让这种思想的土壤日益贫瘠。<sup>③</sup> 1996 年,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和德国历史学会召开了“比较德国和美国社会科学思想中的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研讨会, 印证了上述结论。<sup>④</sup> 受德国思想家布伦奇利( Johann K. Bluntschli) 的影响, 伯吉斯( John W. Burgess) 等曾经留学德国的美国政治学家一度致力于在美国内战后引进国家理论, 加强民族主义。但众所周知的是, 后来美国的国家观是实用主义的, 大部分情况下将国家看成工具性的守夜人。

## (二) 政治自主驱动“范式自主”

意识形态是解释政治制度如何塑造范式选择的中介变量。假如德国接受了实证主义范式, 那么在范式约束下很难为德国的国家观及政治制度辩护。19 世纪的实证主义范式从前提、推理到结论都指向否定德国的政治制度, 它将人视为以利益为目标的原子化个体, 人类社会中的个人

① Jerry L. Petr, “The Nature and Necessity of the Mixed Economy”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 21, No. 4, 1987.

② 彼得·德鲁克《生态愿景》, 第 85 页,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0 年版。

③ Rudolf Vierhaus, “Wir nennen’s Gemeinsinn ( We Call It Public Spirit ): Republic and Republicanism in the German Political Discussio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Jürgen Heideking, et al., *Republicanism and Liberalism in America and the German States, 1750 – 1850*, 1st ed., Cambridge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30.

④ Jürgen Heideking, James A. Henretta, “Introduction” in Jürgen Heideking, et al., *Republicanism and Liberalism in America and the German States, 1750 – 1850*. 1st ed., Cambridge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4.

与自然世界中的原子成为相似的研究单位。理性人追求不受制约的利益最大化,否认国家对公民生活具有天然支配权。沿袭这一假设,实证主义政治学认为国家是由理性人组成的利益集团的竞争场域,政治行为与自然世界一样有客观运行规律,可以用科学化模型来解释。即便在国家主义传统较重的法国,政治学也强调多元主义。在英国、美国,大量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在20世纪初转向多元主义路径。如同埃利斯(Ellen Deborah Ellis)所说,“多元主义者拒绝了德国的威权主义,阐明了真正民主的政体”。<sup>①</sup>

面对实证主义范式的国家观带来的认识论危机,历史主义范式提出“个体性”与“同一性”概念,对其进行了解构和修正。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认为实证主义范式通过将自然科学的因果法则机械地应用于人文科学,加深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立。“个体”在德国思想史上可以追溯到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的“单子学说”——每个个体(包括民族、文化)都遵循独特的内在法则。而“同一”则来自黑格尔(G. W. F. Hegel),即一切个体有助于实现唯一的理性。早期,历史主义较多受到了同一性观念的支配,与自然法有很强的联系。后来,历史主义将个体性放到了与同一性同等重要的位置。“一切个体性来自于神圣自然的子宫,同一性展现了一种不可见的却强有力的纽带,将丰富的个体联结起来,否则个体就要分崩离析。”<sup>②</sup>

历史主义的“个体-同一”认识论,映射的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民族或国家如同个人一样是有“生命”的。彼此影响的民族或国家的“生命”中发生的单个历史时刻、伟大事件,会将其引向何种道路,无法从过往发展趋势中预测出来。<sup>③</sup>这种有机的、具有独特生命历程的国家观,深刻体现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伯克(Edmund Burke)强调的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有机联系,在德国引起共鸣。<sup>④</sup>迈内克认为,伯克提倡尊敬“国家生命”中传统的力量、风俗习惯的力量、本能的力量和无意识的感受,最早对18世纪的国家解释产生冲击。历史主义还认为,国家不是一个“供闲暇时躺下的坐垫”,也不是一个接受公民税收并提供服务的“商业、贸易与保险公司”,而是牵引、吸引着个人内心深处的思想和情感。用伯克的说法,“国家是不朽的家庭”(immortal family)。<sup>⑤</sup>历史主义视角下的民族和国家的特殊性,不是德意志浪漫主义传统“根深蒂固的民族精神”,而是一种体现在认识论层次的范式要素,这种动态的、有机的国家观反驳了实证主义的多元化、工具化国家观念。

实证主义隐含的“进化论”与美国内源性的意识形态高度契合。“进步”和“例外论”是美国政治合法性的元叙事框架。“进步”来自实证主义从生物学中汲取的“进化论隐喻”,暗示了一种乐观主义,即普遍的模型通过人类理性的修正和优化,可以推动历史不断进步。美国认为自身的制度是普适性资本主义代议制在新大陆的试验,融合了英国式议会民主和法国式大众民主。此外,当欧洲实证主义者强调社会规律的不可逆性时,有一定的悲观倾向,美国学者将其改造为“定向进化论”,宣称新教伦理与宪政民主的结合是人类理性发展的最高阶段,以此论证自身的“例外性”。这种意识形态一直延续到冷战,作为冷战战略纲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引用了《独立宣言》中“坚定依靠神圣天意的保护”的部分。20世纪初,美国进一步将实证主义与“例外论”结合,把社会科学塑造为社会改良的“工程学”(social engineer)。<sup>⑥</sup>

① Ellen Deborah Ellis, “The Pluralist St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APSR)*, Vol. 14, No. 3, 1920.

②③ 梅内克《历史主义的兴起》,第30页,第27页,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

④ 卡尔·曼海姆《保守主义》,第159页,译林出版社2022年版。

⑤ Koppel Pinson, *Modern Germany: Its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54, p. 582.

⑥ 西奥多·M. 波特、多萝西·罗斯主编《剑桥科学史:现代社会科学》,第7卷,第220页。

德国和美国的案例说明,国家追求政治自主的目标驱动其知识社群选择兼容本国制度及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范式。德国政治制度相比于美国、英国、法国的特殊性,使其难以在实证主义范式内为制度的特殊性进行辩护。意识形态具有内源性,德国把特殊的历史和文化看作“政治的替代物”,美国把简明的普世性规律作为政治合法性来源。<sup>①</sup>但社会科学范式的外源性大于内源性,还可以对意识形态进行渗透和塑造。实证主义关于一切个体皆可同质化比较的方法论为美国的代议制民主提供了合法性,也与内源性的美国“例外论”兼容。但对于德国来说,实证主义意味着挑战“父权制国家”观念,可能使政治制度也陷入危险。一个国家社会科学范式的自主性体现在,排除不利于本国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以及隐含对制度或意识形态有批判倾向的研究范式。

### (三)“范式自主”的陷阱

德国与美国20世纪的政治实践及其后续发展,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警示。范式自主有两种“陷阱”。第一种是笃信范式的“价值中立”,忽视其意识形态。“每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都承担着不同的政治任务。”<sup>②</sup>实证主义范式的繁荣源于美国的主动选择,并被美国成为全球霸权的事实所强化。美国政治学擅长以“价值中立”来为知识“脱敏”,以实现传播意识形态的目的。首先,“民主政体”(democracy)被定义为“代议制政府和宪法制度”发生于1923—1925年的三次全美政治学大会,这些会议确立了民主作为政治学核心议题的地位,并推崇用自然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原则来研究“民主”。<sup>③</sup>其次,美国政治学运用实证主义范式时,从未有过“价值中立”的包袱。20世纪初,梅里亚姆领导的“芝加哥学派”加强了美国政治学的实证主义。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作为芝加哥学派成员和APSA主席,继续推进政治学的实证主义范式,却不妨碍他倡导政治学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宣传(propoganda)。在他看来,宣传可以为任何事业服务,只是一个“工具”,没有道德或不道德之说。<sup>④</sup>在美国霸权逐步彰显的过程中,实证主义以“价值中立”的名义催化了现代化理论、民主转型学等遵循该范式的“普世知识”的全球传播。但英国学者不完全认同美国的“实证主义政治学”范式。<sup>⑤</sup>英国二战后青睐与实证主义相悖的“阐释理论”,布朗(Chris Brown)认为这是英国世界地位衰落后发生的偏好改变。<sup>⑥</sup>

第二种陷阱是过度追求“范式自主”以致盲目自大。德国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的道路,并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后,初代德国历史学家常常从灾难性的结果出发来否定德国的特殊道路,历史主义是他们归咎的原因之一。瓦格纳(Fritz Wagner)在1962年批判兰克,称历史主义完全没有看到社会力量对政治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科学和技术导致的现代战争转型。<sup>⑦</sup>1945年以后,历史主义范式不再如过去那样主宰德国社会科学。新一代德国社会科学精英深刻反省了他们的方法论和政治价值观,例如谢德尔(Wolfgang Schieder)、孔茨(Klaus Tenfelde)和瓦格纳(Peter Wagner)等。<sup>⑧</sup>当代德国历史学“生活在一个双重世界之中,以一种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德国民族国家及其历史,并依然深深依恋这个民族和唯心主义传统”。<sup>⑨</sup>

① 沃尔夫·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第2页,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

② 多萝西·罗斯《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第8页。

③ 西奥多·M. 波特,多萝西·罗斯主编《剑桥科学史:现代社会科学》,第7卷,第316—317页。

④ 宫承波、管璘主编《传播学史》,第31页,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4年版。

⑤ Leonard D. White, “Political Science, Mid-Century”,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12, No. 1, 1951.

⑥ Chris Brown, “IR Theory in Britain—The New Black?”,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2, No. 4, 2006.

⑦ Fritz Wagner, “Rankes Geschichtsbild und die moderne Universalhistorie” in *Archiv für Kulturgeschichte*, No. 44, 1962.

⑧⑨ 格奥尔格·G. 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第361页,第355页。

## 六、结语与局限

为何相同的社会科学范式在不同国家会被接纳或排斥? 本文通过比较 19 至 20 世纪德国(排斥实证主义、创建历史主义)与美国(接纳实证主义)的案例,揭示了国内政治制度是如何影响社会科学范式自主性的。其作用机制在于:特定政治制度下的知识社群会筛选与一国内源性意识形态兼容的社会科学范式,巩固本国制度的合法性。在美国,实证主义预设的个人主义原子化社会观、普适性规律和进步史观,不仅与多元民主制的意识形态契合,更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工具,将现代化理论、民主转型学等知识去政治化。在德国,实证主义范式与德国政治制度存在“水土不服”,历史主义范式的“个体-同一”认识论映射了个人与国家有机统一的关系,为“父权制国家”和中央集权制度的特殊性进行了辩护。

意识形态在政治制度与范式选择之间扮演着关键的中介角色,它既根植于本国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具有内源性、稳定性,又在外源性范式的冲击下充当着“调节阀”,调节着吸收外来范式的强度与方向。这一发现挑战了社会科学范式“价值中立”的神话。某种程度上,范式本身就是一种“认识论政治”(epistemic politics),它承载着特定的价值预设,又影响着关乎政治现实的意识形态。因此,理解“范式自主”的核心在于认清范式与内容(意识形态、政治学知识)的辩证关系。在全球化时代,既要警惕外源性范式披着“普世皆准”的外衣对本土意识形态的隐性塑造,也要避免囿于特殊历史传统而陷入相对主义、拒斥知识交流与共同体建构的陷阱。关键在于,在具体问题中,必须确保所选研究范式与研究问题、目的和设计的方法论的内在一致性,并在范式选择上保持开放与反思的自觉。

作者: 银培菡,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市 200433)

(责任编辑: 阳军)

scope and boundari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fiscal functions depends on the multi-faceted attributes of finance ,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magnitude and the nature of fiscal functions. What the modern fiscal function is and how it functions need to be understoo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process of the fiscal function on the basis of grasping the fiscal attribute. The “Order-Capacity-Interest” framework emerges as a paradigm for analyzing the fundamental logic and processes of fiscal functions. Following this logic , modern fiscal function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political governance , economic governance , social governance , cultural governance , and ecological governance functions. These five functions are not mechanical transplants from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but rather inevitable outcomes of adapting to governance needs and unleashing the functional attributes of fiscal governance. Only by examin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economic foundations and superstructures , technical logic and institutional logic ,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can we truly grasp the role and functions of public fi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is is the “fiscal cornerstone” for continuously promoting “reform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fiscal functions; modern fiscal governance functions; order-capacity-interest

### **Political Institution and the Autonomy of Social Science Paradigms——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 Yin Peiqiu( 171)**

**Abstract:** While recent scholarly discourse has emphasized the development of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s , far less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paradigmatic autonomy. This paper conceptualizes “paradigm autonomy” as the tendency of a nation’ s epistemic community to selectively adopt and reform social science paradigms. Functioning as the bedrock of knowledge systems , paradigms constitute not merely methodological toolkits but cognitive architectures that recursively shape both ontolog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frameworks. Through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of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spanning the 19th to 20th centuries , this study reveals how political institutions function as the primary determinant of paradigm autonomy. Epistemic communities

systematically favor paradigms that align with their political system's legitimizing ideologies. The individualistic and universalist approach of positivism contrasted with Germany'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spurring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ist alternatives. By contrast, American pluralist democracy found positivism's "value-free" stance ideologically congenial—facilitating the global diffusion of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democratic peace research. While paradigm autonomy manifests national rationality in knowledge production, it remains dialectically constituted through the autonomy-embeddedness dynamic of social science.

**Key words:** social science paradigms;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s; ideology; positivism; historicism